

## 從馬爾庫塞與西方新左派運動的關係 看“黃馬甲抗議活動”

涂鵬

四川外國語大學社會與法學院

**摘要** 2018年末法國爆發“黃馬甲抗議運動”，它在社會背景、行動目標和行動方式等方面與半世紀前的新左派運動具有高度可比性。本文嘗試從社會理論和社會運動的關係這一視角入手，通過回顧新左派運動與其主導思想（馬爾庫塞的社會批判理論）之間的互動，梳理兩者從親和到分裂的歷史過程，從中探討體系化的社會理論對一場社會運動的作用和意義，並對當下西方的社會思想與社會運動進行現實性反思。

**關鍵詞** 黃馬甲抗議運動、新左派運動、社會批判理論、馬爾庫塞

2018年末，一場震撼世界的“黃馬甲抗議運動”（Yellow Vests Movement）在法國爆發。它始於對馬克龍政府提高燃油稅政策的抗議，隨後迅速發展為牽涉廣泛的社會運動。在歷時數月的運動中<sup>1</sup>，工人階級、中產階級、學生和外來移民等群體都積極投入其中，巔峰時期的抗議人數達到28萬之多。<sup>2</sup> 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自伊始便與發生於半世紀前的新左派運動（New Left Movement）聯繫起來，不同學者和評論家就兩者的社會背景、主體構成、行動目標和行動方式等進行了多方位的比較。<sup>3</sup>

本文認為，雖然兩場運動就以上因素而言各有異同，但更為重要的是運動背後的思想支持與理論依據。目前學界對黃馬甲抗



議運動的普遍共識是其自發性與非組織性，<sup>4</sup> 而這恰好是缺乏系統性理論基礎的後果與表現。與之相反，新左派運動從誕生至銷匿都與當時流行的社會思想糾葛纏繞。因此，本文以號稱“新左派之父”的馬爾庫塞的社會批判理論為切入點，希望通過梳理新左派運動與其思想的互動，反觀黃馬甲抗議運動，以此探討體系化的社會理論對一場社會運動的作用和意義。

## 一 史實層面的分與合

在正式討論之前，需要澄清的是，雖說馬爾庫塞享有“新左派之父”的名號，而且他的社會批判理論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推動著新左派運動的發展，但馬爾庫塞本人並未直接從行動和組織上介入運動，他對新左派的聲援更多體現於通過集會演說來表達相似的觀點與有限的支持。所以，兩者的互動基本是在思想層面展開的。只不過，自帶實踐指向的批判理論在社會運動的土壤中不自覺地完成了向具體行動的滲透，從而讓思想層面的互動產生出社會影響和政治效果。

若以發生學考察，馬爾庫塞的社會批判理論與新左派運動之間即非直接的因果關係：一方面，在運動早期，馬爾庫塞的學說並未獲得社會性關注，此時的新左派尚苦於為各種宣言和呼籲尋找體系化的理論支撐。另一方面，馬爾庫塞在1965年之前出版的作品也未注意到運動的端倪而導致對社會前景的悲觀判斷。可見，兩者在平行的道路上朝著共同的方向各自前行了一段路程才彼此相遇。這種看似無意卻又註定的關係更接近於韋伯所說的“選擇性親和”（selective affinity），只是由於缺乏明確的因果聯繫，這樣的“親和”給兩者的互動埋下諸多不穩定因素。



二戰後，馬爾庫塞長居於美國，他的思想在全球範圍內的傳播亦始於此。《單向度的人》（1964年）出版不久，馬爾庫塞便嗅到了變革的氣息。1965年《壓抑性容忍》（*Repressive Tolerance*）一文在美國發行。他在文中猛烈抨擊了當時美國政府針對左派人士的暴力行徑以及在全球範圍內實施的帝國主義霸權，這與新左派的態度不謀而合，兩者就此拉開思想對話的序幕。

1965年，布蘭戴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出於政治上的考慮拒絕與馬爾庫塞續約，他隨後轉投左派重鎮加州大學，在聖地牙哥分校任教，直至退休。而事實證明了他的選擇：1966至1967年間，馬爾庫塞分別出席在洛杉磯分校、聖地牙哥分校和伯克利分校舉行的時事會議並發表演講，激烈抨擊當時美國的對內對外政策，揭發其真實目的——不惜一切代價遏制共產主義的擴張，以及鎮壓第三世界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以此維護既有不平等統治秩序。<sup>5</sup> 這些觀點在校園引發了廣泛共鳴。

到了1968年，新左派運動不論從組織規模還是抗爭形式都達到新的高潮，並有激進化的趨勢，馬爾庫塞對此深表憂慮。儘管出現了嫌隙，兩者還是保持著良性互動。同年5月，法國爆發“五月風暴”，馬爾庫塞給予積極評價，<sup>6</sup> 強調它的重要借鑒意義，即促成新左派與工人階級的聯合。<sup>7</sup> 但與此同時，馬爾庫塞的學術名聲也把他暴露於反對者的仇恨之中。1968年7月，他收到3K黨發出的死亡威脅，並於當月前往歐洲，直到9月返回。

這件事可視作馬爾庫塞與新左派運動“蜜月期”的終結。此後，他在公開場合露面的次數有所減少，他也儘量保持對新左派的克制態度，甚至時常對運動不斷激進化的做法表露不滿。同年12月，他發表系列講話，梳理兩者的關係。針對越發失控的局面，他指出新左派運動的任務應聚焦於“啟蒙、教育、發展政治意識”，並首次提出清晰的革命策略，如保持組織團結、採用適度暴力的“政治遊擊戰術”、接受“新工人階級”概念等。<sup>8</sup>



這些言辭難免引起激進派的猜忌與不快。他們懷疑馬爾庫塞在用“價值中立”的態度來逃避實踐責任，乃至與資產階級妥協。隨著新左派的內部分裂，以“氣象地下組織”<sup>9</sup>為代表的極端激進派徹底拋棄了他的思想。這種分裂最終將新左派運動引向失敗，馬爾庫塞所期望的社會革命終究沒能夠轉化成事實。

雖然馬爾庫塞將活動的重心放在美國，但這絕未降低他在歐洲的影響。1967年，《單向度的人》被施密特<sup>10</sup>翻譯成德文，其中思想迅速得到青年學生的追捧，馬爾庫塞的聲望也直逼常居於當地的霍克海默、阿多諾和哈貝馬斯等人，由此拉開他與歐洲新左派運動積極互動的序幕。

1966至1968年間，馬爾庫塞多次飛赴西德、英國、法國、義大利等地巡迴演講和參加討論，介紹正在美國社會發生的反抗運動，並結合當下局勢分析歐洲新左派運動的特徵和前景，<sup>11</sup>孕育出《烏托邦的終結》（*Das Ende der Utopie*）、《激進反抗中的暴力問題》（*Das Problem der Gewalt in der radikalen Opposition*）<sup>12</sup>、《從富裕社會解放》（*Liberation from the Affluent Society*）<sup>13</sup>等多篇著名演講。

經過上述活動，馬爾庫塞在歐洲名聲鵲起，新左派仿佛終於找到能為他們代言的“精神導師”<sup>14</sup>。馬爾庫塞也欣喜地看到，在工人運動傳統深厚的歐洲，新左派運動開始得到工人的同情和支援，這種聯合（縱使是短暫的）造成了巨大的社會示範效應。

但是社會思想與社會運動的鴻溝從未徹底消除。隨著兩者互動的進行，彼此間的分歧逐漸演變為公開的批評和質疑。一邊是馬爾庫塞希望獨立於新左派運動的態度，以及讓工人階級重回革命領導地位的呼籲，另一邊則是新左派對馬爾庫塞革命動機的猜忌（體現於愈發頻繁地干涉和破壞他的演講）。其後的發展基本與美國一致：新左派運動走向勢微，馬爾庫塞的影響也相應地縮回學術界。



## 二 思想層面的親和交融

### （一）在相似的發展道路上彼此相遇

#### 1. 從存在主義到歷史唯物主義

總的來說，新左派運動和馬爾庫塞社會批判理論具有相似的發展軌跡，兩者都分別從存在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兩種思想傳統中汲取養分。

馬爾庫塞最初受到導師海德格爾的影響，致力於用歷史唯物主義“填充”存在主義的抽象性與非歷史性留下的理論空缺。<sup>15</sup> 但海德格爾式的表述始終不能很好地在具體的社會現實中找到落腳點，直到1932年《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首次公開出版。

手稿發行當年，馬爾庫塞便予以“開拓性的解釋”<sup>16</sup>。憑藉“異化”、“勞動”和“本質”等核心概念，他徹底擺脫了海德格爾的陰影，用勞動本體論取代存在主義，兼顧抽象的人之本質與具體的歷史的社會存在條件。理論的皈依也促成馬爾庫塞加入“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此後，他遵循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脈絡重構了整個社會批判理論的骨架：結合當時資本主義的社會曆條件，他重新詮釋黑格爾的“批判理性主義”（《理性與革命》），揭露人的本能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即異化勞動的過程中被壓抑的事實（《愛欲與文明》），以及批判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歷史辯證的維度悉已喪盡的現狀（《單向度的人》）。這些理論遂漸構成馬爾庫塞龐大思想體系的主線。

另一邊，早期新左派運動尚未廣泛接觸馬爾庫塞的社會批判理論，其思想綱領既深受以薩特、加繆等人為代表的激進存在主義的影響，同時積極吸納米爾斯、古德曼等左派思想家的批判理論。1962年，民學會時任主席海頓（Hayden）發表《休倫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sup>17</sup>，它成為新左派運動的“奠



基础性”<sup>18</sup>。《宣言》刻意淡化了意識形態的表述，把焦點落於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生存問題，並針對美國已經制度化的自由主義進行深刻批判。《宣言》聲稱<sup>19</sup>，當前社會的主要癥結在於人在這個制度化官僚化的富裕社會中日益“疏離”，這是包括階級分化在內的其他問題之根本。從這個意義上說，早期新左派運動不只滿足於創建新的社會秩序，而更期待改善或恢復被異化的人性，以消除無盡的焦慮和恐懼。因此，存在主義和人本主義馬克思主義為新左派運動奠定總體基調和發展道路——不必再依靠處於“休眠狀態”的工人階級，也可把自己納入社會革命和解放的歷史進程。

在接受馬爾庫塞的社會批判理論後，新左派也開始有限地承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地位。儘管保留了對人的存在狀況等“元問題”的眷注，他們更把矛頭對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模式、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等“具體問題”，嘗試在歷史條件中展開革命實踐與解放運動。在與歷史唯物主義聯姻的過程中，他們越發標榜自己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繼承（乃至不惜與工人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也越發信奉社會主義的各種主張。一時間，有關中國、越南和古巴等社會主義國家及領導人的思想、口號、書籍和頭像成為最風靡的時髦之物。只是，新左派對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解過於簡化、扭曲，以至偏執，這讓運動失去了以往由思想和實踐的互動而帶來的前進動力，終將其引向無政府主義的失控邊緣。

## 2. 藝術領域的互文

新左派運動在文化藝術方面的成就與馬爾庫塞的藝術解放理論形成了呼應。

二戰後的高壓環境也催生出藝術界的不滿與抗爭，影響最大的當屬“反文化運動”<sup>20</sup>。這些先鋒派藝術普遍蔑視由主流文化



主導的傳統藝術，嘲諷其陳腐的內容與僵化的形式，尤其是同現代性、意識形態以及既有社會統治秩序的共生關係。在冷戰與核戰的威脅下，它們的藝術作品還透露著“末世情結”的憂慮。另外，這些生於反叛的藝術天生就有著強烈的社會變革意願，由而天然地與左派社會革命力量發生“化學反應”——它們為新左派開闢了特有的話語管道，讓他們得以在藝術行為中表達對社會現狀的控訴，直至完成反抗目的。

在反文化運動的佐證下，新左派對內用光怪陸離的先鋒藝術來解構作為資本主義根基的現代性和理性，用玩世不恭的生活藝術來蔑視和挑戰秩序權威，用神秘的宗教體驗來喚回被資本主義社會湮沒的自然感知，用搖滾樂、毒品和性宣告身體的解放和自主；對外，他們積極吸收其他文明的審美態度，並高聲疾呼廢除文化領域的審查制度，建立區別於大眾媒體的“獨立媒體”（alternative media）。經由這些方式，新左派把個人的文化藝術體驗昇華為對當前社會秩序和政治結構的超越，讓政治行動與個人身份認同以及本真性表達形成同一，<sup>21</sup> 在文化藝術的維度上做到“個人即是政治的”<sup>22</sup>。

在馬爾庫塞這邊，由於選用的批判進路與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傳統略有不同，從伊始他就尤為重視藝術等非物質因素的潛在革命性。在新左派運動和反文化運動思潮的啟發下，他在晚期重拾藝術解放論，努力挖掘出潛藏在藝術自主性中的否定傾向和批判維度，並期望用藝術的邏輯和規則建構出理想的非壓抑性社會。他先是繼續著重藝術審美的社會政治意涵——藝術審美創造出真正的“生活世界”，從而解放了人們對自由的需求，促進著自由的實現。<sup>23</sup> 接著他指出，人類要避免在建制與革命之間的輪回，就得與既有的統治邏輯和組織方式徹底決裂，而藝術恰好承接了這種可能。藝術自身擁有獨立於現實原則的美學原則，這既是藝術的超越性之所在，也是藝術打破技術理性的霸權而建立



全新社會的理想之所在。經由馬爾庫塞的闡述，曾囿於主觀意義的藝術體驗變成了具有普遍政治意圖的社會活動，曾懸置於現實之上的形而上學美學原則變成了實踐層面的審美救贖。這樣看來，新左派運動的反文化藝術主張與馬爾庫塞的藝術解放理論不僅相互確證了共同的革命願景，還彼此踐行著共同的革命主旨，這種“殊途同歸”看似機緣，實則註定。

## （二）在激進化的道路上相互促進

在歷史的時空裡相遇後，新左派運動與馬爾庫塞的社會批判理論都出現激進化的傾向：一方面，通過新左派運動得到行動上的確證和鼓舞後，馬爾庫塞一掃之前的悲觀語調，用更為大膽激進的論述來表達革命解放的必然性與現實性；另一方面，在法農<sup>24</sup>與馬爾庫塞的理論進入新左派的視野後，運動發生了第一次激進轉向：因為這些傳統左派理論的注入，運動日益遠離《休倫港宣言》定下的革命基調——他們不再相信漸進式的民主路線，轉而擁抱“大拒絕”（the great refusal）、“壓抑性容忍”和“革命暴力”（revolutionary violence）等概念，期望以激烈的革命手段抵抗資產階級政府的鎮壓。

可見，馬爾庫塞總體論述基調的激進化是與新左派運動的激進化同步的：新左派的激進行動為馬爾庫塞的理論提供了現實參照，而這些激進的理論又讓新左派的行為在學理上變得“合理”與“合法”。這種互動關係主要從以下方面展開：

### 1. 感性的解放

1960年代，性解放、迷幻劑、搖滾樂和東方宗教都被納入反文化運動的具體內容，它們對快樂的滿足、對自由的追崇、對制度和禮俗的逆反吸引著新左派前仆後繼地加入這場“狂歡”。而





新左派也隨即在《愛欲與文明》中找到了理論對應，如“文明對愛欲的壓抑”、“愛欲的昇華”、“愛欲的多樣表現形式”、“快樂原則的滿足”等等，此類表述與感性體驗的要求高度相似，這也成為他們追隨馬爾庫塞的重要原因之一。

受馬爾庫塞思想的激勵，這種崇尚在“愛欲”的名義下愈演愈烈。他們時常居無定所、四海為家，在汽車、在森林、在廢舊工廠、在露天音樂節吸食迷幻劑，而後不分性別地瘋狂做愛，追求極致的感官體驗。實際上，馬爾庫塞並不反對這類行為，反而指出這些行為帶來的政治後果具有非凡的革命和解放意義。但讓他無法接受的是，新左派借著他的旗號沉溺於放縱和虛無的行為本身，渴望著轉瞬即逝的極端快感，繼而有意無意地曲解了其社會批判理論的本意。

以上憂慮構成他撰寫《社會主義的生物學基礎？》（*A Biological Foundation for Socialism?*）和《新感性》（*The New Sensibility*）<sup>25</sup>的主要動因。文中他重複了《愛欲與文明》裡對性解放的看法：單純的性解放並不會觸及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秩序——它反倒起著“社會安全閥”的作用，即在既有社會結構內釋放反叛的壓力。<sup>26</sup>為了讓感官體驗發揮政治作用，馬爾庫塞提出將革命深入本能結構並建立“新感性”的說法，<sup>27</sup>避免感性解放停留於膚淺的感官快感體驗，而將其切實地轉化為政治解放。

所以，馬爾庫塞與新左派在感性解放這件事上是相互推動的：一面是新左派通過感性解放尋獲感官滿足，並引用馬爾庫塞的觀點作為理由或藉口，在這條路上越走越遠；另一面則是新左派對快樂和自由的肆意追求放發他思考如何把感性解放與政治解放聯合起來，由而不自覺地把理論發展置於激進化的方向。畢竟新左派的反叛行為已具有“本能革命”和“新感性”的形式，缺少的只是實質的社會批判內容；畢竟馬爾庫塞曾見證了“要做愛



不要作戰”（make love, not war）、“個人的即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等口號以及“為槍插上玫瑰”等行為的魅力與效力，<sup>28</sup> 他有理由相信這種聯合的可行性與可期的實踐效果。

## 2. 教育和知識的政治化

同樣，以學生為主的新左派在全面接觸馬爾庫塞之前，就已在校園展開各式各樣的抗議活動，既有民學會和“解放學校運動”<sup>29</sup> 等組織規模較大的運動，也有針對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社會不平等、越南戰爭的抗議。

隨後，馬爾庫塞的影響開始發揮作用。他尤為關注身處的教育領域：在單向度的壟斷資本主義社會中，教育已被扭曲與濫用，具體表現為教育只能直接反映社會存在，對有關價值判斷或道德選擇等問題避而不談，以至於讓知識失去否定和批判現實的能力，進而被資本主義生產體系收編並轉化為社會統治與控制的工具。而新左派運動的出現讓他找到教育革命的契機，他借此提出較之前更激進的教育改革路線——“激進的啟蒙”（radical enlightenment），<sup>30</sup> 即主張廢除學術研究中虛假的價值中立原則，恢復批判和否定不合理現實的能力，讓教育不再淪為統治的幫兇，讓知識在重新“政治化”的過程中對抗現實的不公與壓抑。

受其啟發，新左派的抗議運動也更上一臺階。他們回應馬爾庫塞的理論，致力於打破既有的學術框架和結構，讓知識承擔起人類歷史發展的責任，並以此為據發起一波又一波呼籲教育改革和社會變革的行動。在1968年運動達到巔峰之際，美國和歐洲超過半數的大學牽涉其中，靜坐罷課、演講示威和佔領學校等抗議行動在校園遍地開花。<sup>31</sup> 這些行動還同當時社會爆發的各種民權運動（特別是反越戰抗議）交織，逐步升級為全國性運動，其中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春季運動”<sup>32</sup>、“芝加哥之戰”<sup>33</sup> 和法國的五月風暴等為代表。



但馬爾庫塞也道出，對於這些學生來說，最有力的武器就是他們的知識，可他們尚未完全把它利用起來，他們所做的本質上仍是一場“校園運動”而非政治性的解放革命。因此，馬爾庫塞希望他們能真正地走出教室和校園，走進社會，特別是與工人階級組成“聯合戰線”（united front），以更激進的方式喚起大眾的革命意識。這般才能把教育和知識融入政治鬥爭，即實現“政治性教育”的目的。

如斯，教育和知識的政治化成為新左派運動與馬爾庫塞的主要論題之一。在不同地方，馬爾庫塞都談到了讓新左派參與“政治性教育”的主張，<sup>34</sup> 而新左派也確實利用馬爾庫塞的理論，將運動的影響力擴展至全社會。

### 3. 暴力革命

如前所述，大部分新左派在接受馬爾庫塞和法農等人的思想後便轉投更激進的策略，原因是他們相信不必依靠“陳詞濫調”的理論傳統，也無需等待所謂“客觀條件”的成熟就可以發起革命，新的理論體系和行動方式都應創立於革命實踐並應用於對世界的徹底改造。<sup>35</sup>

然而馬爾庫塞也深知，無論是“非壓抑性社會”還是“大拒絕”都無法滿足新左派運動的切實需求，這些抽象的概念和觀點必須得到具體化。但首要問題就是，在現實的革命實踐中，革命物件不再是理論中的統治階級或利益集團，不能像書中一般用文字將其“否定”或“超越”，他們是現實中具象的資產階級政府、行政部門和暴力機關，假如想於短時間內在對抗中取得優勢，就必須與其短兵相接。因而，論證直接衝突及其暴力手段在解放革命中的合法性與必要性就成為馬爾庫塞後期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例如他辨析了“容忍”的概念：容忍並非普世的道德價值觀，它也有具體的歷史條件，比如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



中，容忍的內容就成為那些維護意識形態和階級統治的“條件與模式”，本質上無異於壓抑性統治的“幫兇”，<sup>36</sup> 因為如果社會完全是非理性的和破壞性的，那麼就必須以武裝的形式去反抗它。<sup>37</sup>

有了馬爾庫塞的理論支援，新左派如虎添翼，轉向更為激進的策略——激進派不光把暴力手段當成唯一的表達方式（以“氣象地下組織”為代表），他們還把政見相左的人都視成“妥協者”或“投降派”而進行無差別的批判或攻擊，到最後就連馬爾庫塞也未能倖免。故而，佔領學校行政大樓、街頭遊行示威、與員警衝突等行為逐漸升級為綁架和刺殺政客、襲擊公共設施、製造火災爆炸等具有“恐怖性質”的行動，暴力行為也如它所反對的容忍一般，“從手段變成了目的本身”<sup>38</sup>。對於失控的形勢，馬爾庫塞也不得不及時作出批評，並特地澄清極端暴力行為與社會批判理論之間不存在必然的聯繫。他還特地強調，激進運動的困境在於，激進的變革需要群眾支援，但過於激進的鬥爭方式又會疏遠群眾，並引起更強烈的鎮壓。馬爾庫塞援引法國《人道報》（*L'Humanité*）的一段話——針對五月風暴後右派政黨在選舉中獲勝之事——“每個路障、每輛被點燃的汽車都為那些戴高樂黨奉上成千上萬張選票”<sup>39</sup>。

### 三 核心問題上的分歧

如前所述，新左派與包括法蘭克福學派在內的傳統左派一直處於搖擺不定的糾葛之中。縱然正值兩者的蜜月期，分歧就已浮現。在一些具體問題或核心原則上，左派理論的影響始終無法沖出抽象的界地，思想與運動的互動往往止於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溝壑。



### （一）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

“新左派”為了突出與傳統左派的區別而刻意強調“新”的一面，關鍵一點就在於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馬爾庫塞曾在《激進反抗中的暴力問題》的演講中比較了新左派與傳統左派，並概括出前者的三個基本特徵：一則，馬爾庫塞直接將新左派定性為“新馬克思主義”（neo-Marxism），因其深受當時第三世界革命運動及其理論的影響，而非直接溯源於馬克思的經典思想；二則，新左派具有“新無政府主義”（neo-anarchism）傾向，他們不信任傳統左派的政黨概念和政治路線，而是在文化藝術和精神分析等領域實驗新的社會組織形式；三則，新左派不局限於把工人階級視作革命唯一的主體。<sup>40</sup>

的確，誕生於戰後發達工業社會與消費資本主義的新左派，沾染著鮮明的歷史屬性，相較於傳統左派對馬克思主義的忠誠，他們更願意用時代的濾鏡去解讀和改造馬克思的理論。在新左派看來，包括法蘭克福學派在內的傳統左派的最大問題莫過於，他們忽視了當下資本主義社會已不再是馬克思所處的那個社會，例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形成高度壟斷，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陸續進入物質充沛的富裕社會，資產階級的社會控制體系浸透到日常生活世界，工人階級的概念亦無法囊括新湧現的社會階級，這一切都挑戰著既有理論模式和分析範式。

不同於傳統左派的做法——堅守馬克思的基本原理並在此基礎上融合其他思潮，新左派更善於“審時度勢”，他們既指責傳統左派過於拘泥於“馬克思主義教條”而造成與現實脫節，同時毫無顧忌地挪用、截取、重釋那些有利於運動的部分。比如在指導思想上，新左派時而弱化馬克思關於階級鬥爭和意識形態等理論傳統，轉而援引一些當時社會流行的思想作為行動指南——從前期對薩特和加繆等人的存在主義的推許，到後期把馬爾庫塞的



社會批判理論奉為“先知預言”。但是當需要動員大眾參與到具體行動中時，他們又會毫不猶豫地拾起階級理論，不惜把整個社會置於“敵我矛盾”的“泛階級化狀態”，以階級身份審判反對者；<sup>41</sup> 在實踐行動中，新左派雖不排斥以馬克思的理論為行動指導，卻更偏向於眼前發生的重大事件，試圖在現實的抗爭和運動過程中樹立自己的主旨，漸而形成一種“行動先於思想，實踐先於理論”的“建設性革命方法論”。<sup>42</sup> 如此看來，對於大部分新左派而言，他們從未真正把握甚至嘗試系統地理解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更像是其表達訴求和追求目的的基本工具。

## （二）對待勞動及工人階級的態度

新左派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進一步影響到對勞動及工人階級的態度。雖說馬爾庫塞和新左派都把勞動同工人階級看作問題的一體兩面，但在新左派看來，馬爾庫塞的勞動本體論（直至馬克思的勞動對象化理論）都過於“保守陳舊”。沉浸在感官體驗和自我追尋的新左派大多難以理解勞動本體論的社會責任和歷史意義，對其而言，經由勞動實現本質這條路過於沉重困苦。相應地，作為勞動主體的工人階級也不被視作革命的充分領導。

面對越發響亮的質疑，馬爾庫塞被迫作出回應。他積極整合當時的反叛力量，如激進的知識份子、被壓迫的少數族裔、第三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者等，希望由此組成全社會範圍的“聯合戰線”，為共產主義革命創造先決條件。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這種彌合的嘗試反倒加深了分裂。馬爾庫塞的本意是建立主次分明的聯合戰線，卻被新左派拿來當作“篡權”的理由。一方面，馬爾庫塞堅信聯合戰線必須且只能由工人階級主導。相反，新左派卻不滿足於次要地位，特別是淪為工人階級的附庸，為此他們不惜放大此前馬爾庫塞的憂慮——他



們指出工人階級在新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中已被完全收編到現代“利維坦”式的社會控制體系，<sup>43</sup> 他們不但沉醉於現有物質條件和意識形態，還在消費主義的麻醉下變得愈發落後保守，以至走到革命的對立面。這樣，聯合戰線的意義更多在於填補工人階級的失位，這便成為新左派進入革命陣線並取代工人階級的第一步。

另一方面，新左派也會刻意利用相關理論來證明自己的革命主體性。例如馬爾庫塞在架構新的革命組織體系時，提出建立“新感性”和尋找“激進主體”（radical subjectivity）的願望。<sup>44</sup> 很快，新左派便把這一標籤據為己有，聲稱“激進主體”的身份正是為其量身打造。因為身處資產階級的鐵幕之下，他們擁有把握現狀的思想覺悟和感知能力，能夠意識並體會當前統治秩序帶來的壓抑與苦難；因為不必背負歷史與現實的雙重包袱，他們又有徹底否定和超越實存的勇氣，敢於“與我們所熟悉的看、聽、感覺、理解事物的日常方式的決裂”，敢於在革命鬥爭中推翻這些不合理的社會結構。<sup>45</sup> 總之，他們是唯一具備“新感性”的主體，也是唯一能在現實中實踐“大拒絕”的主體。

新左派的強勢態度斷絕了其與工人階級和解的可能，也澆滅了馬爾庫塞最後的希望。儘管工學聯盟在“五月風暴”等運動中展示出巨大威力，<sup>46</sup> 但兩者在思想上的誤解和言語上的指責亦不時地演變為直接肢體衝突。<sup>47</sup> 馬爾庫塞最後不禁惋惜地感歎，新左派從未真正地把工人階級團結進自己的目標和話語。<sup>48</sup>

### （三）對待自由主義的態度

另一處重要分歧是兩者對待自由主義的態度。不管新左派承認與否，自其誕生伊始就與自由主義有著難分難解的瓜葛。依照哈威的講法，新左派運動在某種程度上混淆了對個人自由價值的



重視和對社會正義的追求，由此帶來的後果是自由主義同時成為它的攻擊物件和最終目的。<sup>49</sup>

自《休倫港宣言》起，新左派就毫不避諱其與自由主義之間的淵源，他們真正憎惡的並非自由主義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基本主張，而是那些代表寡頭利益集團的“壟斷自由主義”、受政府管控並用於維護既有統治的“制度化自由主義”以及被資產階級用來扼制共產主義運動的“意識形態化自由主義”。但他們期待的也不是傳統左派眼中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國家，而是一種具有美國公民共和傳統的民主模式，即“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這種政治模式能夠針對當時社會問題的根源，讓民眾參與和掌控那些影響其生活的決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公共領域的“疏離感”。可以說，參與式民主才是早期新左派心中理想的社會形態。

即使是後期激進化的新左派所構想的“社會主義”藍圖也非傳統左派所指的社會主義，而更具無政府主義的色彩。像“氣象地下組織”等激進派雖宣稱與自由主義“勢不兩立”，但他們的最終目的仍不失為一種極端的虛無的個人自由主義——一種蔑視任何權威關係、正式結構和主流文化的極端主義。只不過，他們鬥爭的方式日益激烈且漸失方向，不復有如《休倫港宣言》那樣明確的解放綱領，轉而對暴力革命持有扭曲的偏執，以至於到了後期，以反抗行動為導向的革命策略徹底取代了系統性的理論思想。至此，馬爾庫塞、阿多諾和哈貝馬斯等曾經表示支持新左派運動的左派學者也急於與後者劃清界線，如馬爾庫塞公開批評了激進新左派把反對和反抗當成了最終目的，這種“為了否定而否定”的做法把自身囚禁在既有結構的邏輯中，無法完成否定後的“超越”，以至將整個運動引向虛無的迷局。<sup>50</sup>

由以上分析可看到，無論激進與否，新左派運動都天然帶有自由主義的基因。在這種語境下，自由與權威是不可調和的





矛盾，新左派運動也順勢把抗爭的物件從壟斷資產階級及其統治秩序擴展到一切與權威相關的東西。這種具有深厚自由主義傳統的民主路線與整個法蘭克福學派略帶“精英主義”的論調大相徑庭。以馬爾庫塞為例，固然他期望把自由還予社會中的個人，但也時常表露出對民眾的不信任，並借此轉向權威來尋求新的出路。例如在社會公共利益（the common good）與個人自由的兩難困境面前，他區分出建立在“新的理性”之上的“理性權威”（rational authority），將其當作消除無政府主義亂局的良藥。<sup>51</sup> 這類說法標誌著馬爾庫塞同新左派運動的分道揚鑣，也意味著在令人失望的現實面前，他的社會批判理論放棄了“民主式”的實踐鬥爭路線而重新回到形而上的基礎，繼續在各種應然性的表述中充當人類命運的“先知”。不難想像，這些傳統左派很快成為新左派自由旗幟下的討伐對象。

#### 四 結束語

根據以上分析討論可見，發生於半世紀前的歐美新左派運動曾與馬爾庫塞的社會批判理論開展過積極有效的互動，甚至一段時期直接將其作為運動的思想指導，由而產生顯著的社會效果。一方面，新左派運動讓馬爾庫塞看到社會變革的契機，為他的社會批判理論開啟現實性的對話通道，同時也讓他切實體會到這場運動對馬克思主義的挑戰，進而促成上述理論轉向的完成；另一方面，由於馬爾庫塞的社會批判理論產生於對德國古典哲學、存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與繼承，其深邃的學理傳統有助於新左派運動梳理出自身的思想路線（比如融合馬克思主義與存在主義，並在此基礎上架構出一套二重的革命理論體系——既批判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秩序，又關注具體生存境況中人的身心



狀態），由此發展而來的行動口號和策略又為運動帶來龐大的組織基礎。此外，馬爾庫塞提出的“大拒絕”、“新感性”、“激進主體”等說法還是新左派運動的重要理論依據。當然，在這些抽象概念的加持之下，整個運動也不可避免地走入了從激進化到自我消亡的宿命。總之，馬爾庫塞與新左派享有共同的時代背景與社會情境，兩者天然的親和關係讓他們在批判與反抗的物件、目標或行事偏好等方面達成默契，從而絡繹在理論或實踐上支持對方，最終攜手登上歷史舞臺的中心。

如斯，兩場相距了整整半個世紀的社會運動的重要區別便是社會理論在其中的擔當。如前所述，新左派運動的社會效果很大程度上源於相關理論（特別是馬爾庫塞的社會批判理論）的支持與引導。相反，黃馬甲抗議運動自始至終都沒有接納任何體系化的理論作為運動一部分，這既是其“民粹性”突出的原因，也是表現。在這場運動中，社會理論的缺位元意味著沒有系統的行動綱領，從而構成與新左派運動後期相似的局面，即以行動和手段本身為目的的主旨。但具體的目標訴求（如上調最低工資標準、降低低收入者稅收等）取代了宏大抽象的行動綱領，又使得抗議運動的雙方較易達成妥協或共識，所以整個運動的發展趨勢、組織結構、性質意義等都呈現出不同於傳統社會運動的新特徵。

然而更需要我們關注的是這種理論缺位背後的深刻社會原因——西方社會民眾對宏大理論體系及其政治形式的不信任。經過時代的祛魅和解構後（始於新左派運動時期），各種思想制度背後的權力結構悉數得到充分揭露，尤其是作為當代西方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之基石的新自由主義，已難以擺脫社會不平等、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精英主義等標籤，也難以再與社會運動產生有效互動。因此，黃馬甲抗議運動表現出社會理論與行動的隔閡，而這背後又是上層政治建築與底層社會訴求的分裂。只要根植於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和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未根除，不管新左



派運動還是黃馬甲抗議運動，都將以新的形式成為盤踞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幽靈”。

## 注釋

- 1 雖然大規模的抗議運動於2019年3月結束，但零星的抗議活動一直持續至今。
- 2 轉引自 [https://en.wikipedia.org/wiki/Yellow\\_vests\\_movement#cite\\_note-R1-58](https://en.wikipedia.org/wiki/Yellow_vests_movement#cite_note-R1-58)
- 3 Alistair Cole, *Emmanuel Macron and the Two Years that Changed Franc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9), 95–115; Emiliano Grossman, “France’s Yellow Vests, Symptom of a Chronic Disease”, *Political Insight* No.1 (2019), 30–34; Ronja Kempin and Pawel Tokarski, “Macron, the Yellow Vests and the National Debate: Playing for Time, not Solving the Political Legitimacy Crisis”, *SWP* 17<sup>th</sup> March 2019.
- 4 CASIS Vancouver, “Yellow Vests, Right-Wing Extremism and the Threat to Canadian Democracy”, *The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Conflict, and Warfare* No. 3 (2019), 4–5; Angelina Rascouet and Gregory Viscusi, “France’s Yellow Vest Protests Abate as Fewer Take to Streets”, *The Washington Post* 22<sup>nd</sup> December 2018; 魏南枝，〈法國大革命的內在矛盾與“黃馬甲”運動〉，《文化縱橫》第02期（2019），80–89。
- 5 Herbert Marcuse,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Vol. 3: The New Left and the 1960s*, Douglas Kellner,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38–40; 曹衛東，《思想的他者》（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229。
- 6 1968年5月，馬爾庫塞應邀前往巴黎參加紀念卡爾·馬克思誕辰150周年研討會，時逢五月風暴爆發。在親身經歷感受了其影響和威力之後，他發表相關講話並整理成文：《關於法國革命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 7 Herbert Marcuse,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Vol. 3: The New Left and the 1960s*, Douglas Kellner,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43–46.
- 8 同上，122，124–127。
- 9 氣象地下組織（The Weather Underground Organization，縮寫WUO）成立於1969年，其名字啟發於搖滾詩人鮑勃·狄倫（Bob Dylan）《地下鄉愁布魯斯》（*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一曲的歌詞。該組織主張用激

進甚至暴力手段奪取資產階級的統治權，並在現實中製造多起駭人聽聞的恐怖事件。

- 10 阿爾弗雷德·施密特 (Alfred Schmidt, 1931–2012)，德國學者。作為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學生，他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研究。
- 11 Douglas Tallack,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The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Context* (London: Routledge, 2013), 404.
- 12 1967年7月，馬爾庫塞在（西）柏林自由大學發表的演講。《烏托邦的終結》的英譯版收錄於文集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Vol. 6: Marxism, Revolution and Utopia*，《激進反抗中的暴力問題》的英譯版收錄於文集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Vol. 3: The New Left and the 1960s*。
- 13 1967年7月，馬爾庫塞在倫敦園屋劇場 (Roundhouse) 發表的演講，英譯版收錄於文集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Vol. 3: The New Left and the 1960s*。
- 14 Drew Pearson and Jack Anderson, “Marcuse Is Godfather of Student Revolt”, *The Lewiston Daily Sun* 6<sup>th</sup> July 1968.
- 15 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50–51.
- 16 魏格豪斯，《法蘭克福學派：歷史、理論及政治影響》，孟登迎，趙文，劉凱譯（上海：上海人民書店，2010），132。
- 17 1962年，民學會發表《休倫港宣言》，它成為美國新左派運動的奠基性檔，也是早期運動的基礎綱領。在這份聲明中，海頓著力抨擊了當時美國的國內現狀和對外政策，認為這些手段不會起到遏制共產主義的作用，只會危害民主的根基。
- 18 斯泰格沃德，《六十年代與現代美國的終結》，周朗，新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183。
- 19 Tom Hayden, “Port Huron Statement” ([https://en.wikisource.org/wiki/Port\\_Huron\\_Statement](https://en.wikisource.org/wiki/Port_Huron_Statement)).
- 20 反文化運動 (counterculture movement) 是1960至70年代在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發生的系列文化運動的統稱，代表流派有激浪派 (Fluxus)、情境國際主義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法國新浪潮 (French New Wave) 等。它通過先鋒藝術的形式抗議當時主流文化對思想的鉗制，並與新左派運動、反戰運動、女性主義運動等結合，推動文化和政治領域的變革。
- 21 沃林，《東風：法國知識份子與20世紀60年代的遺產》，董樹寶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4。

- 22 迪昂，《為什麼美國人恨政治》，趙曉力等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1），37。
- 23 Herbert Marcuse, *An Essay on Liber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31.
- 24 弗蘭茨·法農 (Franz Fanon, 1925–1961)，法國非裔思想家，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批判、社會批判、心理分析批判和後殖民主義政治研究。他的思想和作品在西方社會引發熱議，也激發了當時的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在代表作《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中，法農揭露了殖民主義對人性的迫害，主張發起針對殖民者的暴力反抗運動。
- 25 兩篇文章收錄入馬爾庫塞於1969年發表的文集 *An Essay on Liberation*。
- 26 Herbert Marcuse, *An Essay on Liber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9.
- 27 同上，7。
- 28 Herbert Marcuse,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Vol. 3: The New Left and the 1960s*, Douglas Kellner,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64.
- 29 “解放學校運動”(Free School Movement)是1960年代中後期在美國，由新左派發起的教育改革運動，它的任務是建立新式學校，改革原有教育模式，減少行政管理的干預，達到教育自主的目的。
- 30 Herbert Marcuse, *An Essay on Liber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25.
- 31 Geoff Bailey, “The Rise and Fall of SDS”,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Issue 31 (2003).
- 32 1968年春季，哥倫比亞大學成為新左派運動的中心，它的抗議行動從4月持續至5月上旬，抗議者與當地警察發生激烈衝突。
- 33 1968年8月，美國民主黨全國大會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在芝加哥召開。應民學會的號召，約1萬名抗議者湧入城市。在眾目睽睽之下，他們與警方的對峙步步升級，終於變成一場“暴動”。
- 34 Herbert Marcuse, *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 (Boston: The Beacon Press, 1972), 28; Herbert Marcuse,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Vol. 3: The New Left and the 1960s*, Douglas Kellner,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124–125.
- 35 斯泰格沃德，《六十年代與現代美國的終結》，周朗，新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203，213。
- 36 Herbert Marcuse, “Repressive Tolerance”, in *A Critique of Pure Tolerance*, ed. Robert Wolff, Barrington Moore Jr. and Herbert Marcuse (Boston: Beacon Press, 1965), 82.
- 37 Herbert Marcuse,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Vol. 3: The New Left and the 1960s*, Douglas Kellner,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13.

- 38 Herbert Marcuse, "Repressive Tolerance", in *A Critique of Pure Tolerance*, ed. Robert Wolff, Barrington Moore Jr. and Herbert Marcuse (Boston: Beacon Press, 1965), 82.
- 39 Herbert Marcuse, *An Essay on Liber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68.
- 40 Herbert Marcuse, *Five Lectures: Psychoanalysis Politics and Utopia* (Boston: Beacon Press, 1970), 83–84.
- 41 沃林, 《東風: 法國知識份子與20世紀60年代的遺產》, 董樹寶譯 (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 2017), 15–16。
- 42 Herbert Marcuse,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Vol. 3: The New Left and the 1960s*, Douglas Kellner,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124–127.
- 43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Classics, 2007), 26–37.
- 44 Douglas Kellner, "Marcuse and the Quest for Radical Subjectivity", *Social Thoughts & Research* No.1/2 (1999), 12–13.
- 45 Herbert Marcuse, *An Essay on Liber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6.
- 46 阿里, 沃特金斯, 《1968年: 反叛的年代》, 范昌龍等譯 (濟南: 山東畫報出版社, 2003), 94–95。
- 47 最具代表性的當屬1970年5月8日發生的衝突。當時, 新左派在紐約街頭舉行反戰遊行, 期間約200名工人突然出現, 他們高舉支持美國政府的標語, 對遊行人士進行驅趕和毆打。次周, 2000多名工人組織了更大規模的主戰遊行。此事之後, 新左派同工人階級的關係降至冰點。克魯格曼, 《美國怎麼了?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 劉波譯 (北京: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8), 74。
- 48 Herbert Marcuse,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Vol.3: The New Left and the 1960s*, Douglas Kellner,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43.
- 49 哈威, 《新自由主義簡史》, 王欽譯 (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6), 42–43。
- 50 Herbert Marcuse,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Vol. 3: The New Left and the 1960s*, Douglas Kellner,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126–127.
- 51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Boston: The Beacon Press, 1974), 224–225.